

“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价值、落地模式与路径探索

王 凯¹,周国鑫²

(1.南京体育学院 教务处,江苏 南京 210014;2.南京体育学院 研究生部,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是党和政府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蓝图绘制，“新型举国体制”是推进这一进程的有力方略。体育强国建设的多维赶超性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保障，任务复合性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主体协同，功能多元性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演进。新型举国体制在领导核心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并日益体现出“元主体”的治理特征，在价值取向上由为国争光的体育转向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在资源配置上由人、财、物等硬资源的计划配置向人、财、物、文化、精神等软、硬资源市场化主导配置转变；在参与力量上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元力量协同增效转变；在发展环境上由原有的融入全球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双循环格局构建；在作用领域上由重点服务竞技体育到更加关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新型举国体制拥有适用于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社会动员”模式，适用于竞技体育关键环节的“政产学研会”深度融合模式，适用于产业链升级和职业体育的“龙头企业”整合带动发展模式。提出了以“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路径：包括发挥元主体价值，选定战略力量，设定重要项目，完善评估激励等。

【关键词】：新型举国体制；体育强国；竞技体育；元主体；元治理；全民健身；人民为中心；社会动员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3)03-0022-11

DOI：10.15877/j.cnki.nsic.20230615.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这比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提前15年^[2]。体育强国建设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当前，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健全^[3]，竞技体育区域发展结构、优势项目和落后项目、竞技体育与青少年体育发展失衡^[4]，体育产业发展规模有限、发展贡献质效亟待提升^[5-6]等问题尚待解决。在任务周期缩短，功能使命明确的背景下，要率先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需要集中力量、重点攻关。举国体制在我国竞技体育强国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要在较短的时间内率先建成体育强国，需要总结借鉴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发展经验，实

施“新型举国体制”方案，以更好地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举国体制也需要完成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需要通过“动员激活常规”的机制来发挥作用^[7]。在体育领域，多元的力量正在逐渐发展，任务的叠加和力量的崛起为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提供了新条件和新要求。本文致力于探索新型举国体制之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价值、科学内涵和落地模式，以期为更好地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提供参考。

1 “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价值

1.1 体育强国建设的多维赶超性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保障

我国竞技体育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通过举国体制

收稿日期：2023-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TY027)。

第一作者：王 凯(1984—)，男，江苏徐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治理与体育产业研究。

的制度设计和保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女排精神、中华体育精神等振奋人心、凝聚力量的民族精神财富。时至今日,在关涉国家大计、国计民生的领域依然需要举国体制予以突破。体育强国建设更需要体育体制从“传统的举国体制”转向“新型举国体制”。根据当前体育各领域发展的特征,体育强国建设显然是一个“多维赶超型”的进程,需要集中全社会的力量予以推进才有可能实现。第一,符合“家国一体”的传统。“举国体制”自农耕文明以来,在对抗自然灾害、保卫家国等事务中便普遍存在,发展到现当代更是如此,国家的存亡兴衰与集体的合意荣辱乃至家庭的颠沛安康与国家都有着唇亡齿寒、荣辱与共的关联。体育强国的实现蕴含着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交流等多维度的强,关系着民族精神的凝聚、社会生活的丰富、就业机遇的增加、文化精神的富足、交流活动的多元等,是典型的民生领域,以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符合家国一体的中华传统。第二,需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保障。缘起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成效已经得到国内外的普遍认同。不同于西方“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中国的体育强国建设是“自上而下”的外生性进程,且是一个多领域并行叠加赶超的进程,需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第三,是“体育事业赶超型发展”要求使然。体育后发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最大“语境”,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的市场、社会力量尚在形成;在群众体育领域,我国的社会力量亟须形成合力;在体育产业领域,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体育企业家精神和优秀企业家严重不足,需要国家“善”的在场和多元力量的整合。

1.2 体育强国建设的任务复合性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主体协同

“新型举国体制”以权威为根本动力,其核心特征是民主集中制,即通过充分民主和充分集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建设国家的能力,形成强大高效的整合力、动员力、汲取力、濡化力、管控力、攻坚力、谋划力、统领力等力量体系来治国理政^[8]。当前,群众体育存在体育场地设施、健身活动指导、体育文化活动等供给不足、分配不均、层次不高等问题,制约着群众体育的高质量发展;竞技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

的核心,存在机制不畅、发展失衡、后备乏力、协同欠缺、变革不深等问题;职业体育在竞赛产品、行业结构、赛事布局、组织职能、运转体系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体育产业存在市场发育不足与体系不全并存、人民消费不足与消费外流并存、市场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等问题;体育交流、体育文化等同样存在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推进体育强国的实现,需要各领域的全面发展、协同发展,需要与之相配的治理制度设计,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契合这一需求的制度设计,就是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格局下统筹多元主体力量协同发力,更好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形成“强政府、大社会”的体育治理格局,突破部门割裂的状态,保障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体育的整体性谋划与推进;畅通多元主体参与体育发展机制,更好地培育与吸纳社会、市场和家庭等主体的力量;更好地应对国内国际体育环境和发展格局的变化,更好地规避“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等现象,形成整体性的以“中国共产党”为元主体的协同整体性治理格局,确保体育强国的如期建成。

1.3 体育强国建设的功能多元性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演进

体育强国建设充分彰显了大众亲和力、国际竞争力、经济贡献力、文化软实力、世界影响力,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事业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既彰显了体育强国成为强国的一部分,更赋予了体育助力强国实现的时代使命。加快体育强国建设需要充分发挥举国体制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深入推进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优先的“体医融合、健身健康融合、体教深度融合”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全面提升人民的健康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的体育获得感;需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科技创新与激励创新机制,推进竞技体育发展的科技创新贡献,提升竞技体育发展科学化水平,完善激励创新机制,调动市场、社会、家庭等各主体的积极性,形成竞技体育发展的合力,优化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实现竞技体育“固本强基、科技助力”的效果,提高国际竞争力和为国争光能力;需要新型举国体制整合政府和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并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资源配置能力,推进“退缩—转强”实践方

式,即以体育需求为导向,遵循体育资源的公共性、经济性以及体育发展规律等,政府从体育资源结构链条中适合市场的中微观领域撤出,转向更多承担资金支持、监督管理、宏观调控等职能,强化产业发展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市场、社会力量不断得到培育和加强^[9]。需要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行政主导能力,加大大中型体育赛事举办,加大国际体育组织关系建构,深化国际体育活动参与,打造自主体育品牌,不断提升体育的国际影响力。体育功能的多元化需要举国体制这一制度自身的保障和创新演进。

2 “新型举国体制”的概念生成与科学内涵

2.1 “新型举国体制”的概念生成

体育“举国体制”一词源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国家体委在总结我国体育优势项目崛起经验时提出了这一制度概念,并逐渐演化成为我国体育体制的代名词。传统举国体制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国家的某项战略目标,以行政力量来动员和调配全国相关力量,集全国有关资源于一域,对影响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领域进行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常规的制度安排。具有政府直接性管理、计划性体制、全部政府投入、无直接经济效益、项目固定单一、政府使用等特点^[10-11]。作用于竞技体育领域,是以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争创优异运动成绩为目标,以国家队建设为龙头、省级专业队为中坚、地(市、县)业余体校为支撑,以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统筹计分为调节标杆,全国一盘棋、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竞技体育组织管理和运行方式。在运行中表现出不计成本、金牌至上等特点。在新的内外环境和体育发展进程中,愈发体现出运行效率递减;部门割裂导致协同与联动不足,阻碍社会和市场力量发挥;调动资源局限于人财物,对精神和文化调动欠缺等。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成熟,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家庭力量等逐渐崛起,举国体制有了新的发展力量和条件。习近平指出:“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为攀登战略制高点、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支撑。”基本明确了“新型举国体制”的价值导向、战略路径、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由此,研究认为体育发展的新型举国体制是以提高体育的大众亲和力、国际竞

争力、经济贡献力、文化软实力、世界影响力为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整合公共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家庭力量等,实现各类体育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最大化利用效率,以常规式治理和动员式治理互嵌的方式更好地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聚焦青少年体育、学校体育、体教融合、重大体育赛事、中国特色职业体育、科学化训练等体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形成权责清晰、制度规范、主体多元、机制有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12-13]。新型举国体制是相对于传统举国体制的概念,在体育发展中国的角色与功能定位、体育资源配置机制、体育发展价值取向、不同要素的动员机制、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体育协会、体育社团、体育企业、家庭等微观主体关系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其更加强调党对体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和科学统筹,更加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和政府体育各项事业发展中的有为,更加强调整维护好市场、社会主体的个体利益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2.2 “新型举国体制”的科学内涵

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为契机,我国正式提出“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向,经过不断深化改革与调整,传统举国体制逐渐升级为新型举国体制,中国体育以更积极、更主动的面貌在国内民生以及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能动作用。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是对传统体育发展举国体制的坚持、调整、优化与发展,是举国体制的现代版,是更加成熟现代的社会主义治理制度体现,是更加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制度。既是我国体育发展的特殊组织模式,更是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增效,注重发展成本节约与效能提升的体育发展模式(表1)。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对传统举国体制领导核心的传承,并日益体现出“元主体”的治理特征。经验表明,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能力和权威地位,能够统筹、动员全国体育资源,调动中央和地方各级主体的积极性,汇聚全国力量,推进全民朝着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奋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新时代语境下,体现出更加“元主体”的治理特点。1997年,英国学者鲍勃·杰索普在“复杂性日渐突出的环境

表1 新型举国体制相对于传统举国体制的内涵特征

Tab.1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nationwide system

特征	传统举国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
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价值取向	为国争光的体育	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
资源内容与配置	人、财、物/计划经济体制	人、财、物、体育文化、体育精神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参与主体	政府为主	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等多主体协同
外部环境	前期世界封锁与后期的全球化态势	世界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双循环
作用领域	竞技体育	体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下,层级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必然倾向失灵”的背景和理论反思基础上提出“元治理”概念。元治理主要致力于通过加强组织学习、公共讨论、谈判协商等手段来解决各主体参与动力不足、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等、权责不协调等治理主体间的矛盾问题。更加注重各类治理方式的适应性问题,强调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特长领域,并强调元力量的主导、协同、支持、规约等作用,与目前我国体育治理的现实比较切合。在“新型举国体制”制度设计中我们应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发展思路,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治理体系中的“元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领导并委托政府行使体育权责,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理机构承载对其他主体的多元责任,促使人民中心体育共同利益的达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源于其权威性还源于其广泛存在于体育的各个领域,包括体育行政机构、体育事业单位、体育社会组织、体育市场主体、体育任务型组织(赛事组委会、申委会等)乃至一些居民个人家庭等,能够更大范围地起到引领、监督、促进、动员等作用^[14]。

第二,价值取向上由为国争光的体育转向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举国体制”的建立、成熟与发展更多服务于国家需要,重视为国争光的使命;“新型举国体制”则强调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关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体育生活的需要。一是,面向全体人民构建更高水平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体育是关系民生的事业,承载着人民身心健康的职能,是健康端口前移的重要作用力量,是丰富人们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是人们开展社交活动、休闲娱乐、缓释压力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体育公共服务被认为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新发

展阶段人们的体育需求不断提升,场地设施、健身指导、赛事活动等全民健身短板日益凸显,应通过“新型举国体制”补足短板,更好地满足人们的体育生活需要。二是,构建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体育发展格局。体育的发展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在新型举国体制建构中要建立针对全体人民的体育诉求表达机制,吸收人民作为体育发展的力量,并共享体育发展的成果,真正提升人民的体育获得感及生活幸福感,使体育强国建设成效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三是,体育全领域施力的体育强国建设。新型举国体制不仅重视提升竞技体育的为国争光能力,更强调群众体育的为民服务力,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力,体育文化的社会凝聚力,体育交流的对外影响力等多元价值协同,是为了推动各领域全面发展而进行的制度设计。诚如党的二十大所强调的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能够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资源配置上由人、财、物等硬资源的计划配置向人、财、物、文化、精神等软、硬资源市场化主导配置转变。一是,在资源配置内容上,由主要聚焦硬资源,向软、硬资源兼顾拓展。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能够为体育的发展提供精神借鉴与文化力量。在体育领域所形成的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等更是能够直接作用于体育事业发展,要充分挖掘软、硬资源对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注重精神引领力与支撑力^[15]。二是,在资源的配置手段上,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统一。由传统的计划主导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关键作用并充分发挥国家作用转变。新型举国体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撑作用,尊重体育发展规律、包容吸纳市场与社会力量,寻求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平衡。用市场手段调配

体育资源,解决体育发展中微观层面的项目立项、决策、运行、激励与分配等问题,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提供体育发展新动力。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谋划者、监管者、服务者的作用:作为谋划者,政府通过发展规划、政策优惠、税收杠杆等引导体育资源流向,促进资源效益最优化;作为监管者,政府应不断完善体育市场规则,构建更加完善的体育市场监管体系,促进竞争有序化;作为服务者,政府应加大对特定领域综合服务能力的提升,培育、扶持好市场和社会力量。通过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让新型举国体制在新时代迸发强大的生命力。

第四,参与力量上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元力量协同增效转变。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体现,是在应对重大事件、重点领域突破实施的组织、动员、宣传能力的财富表征。新型举国体制将更注重多元主体的协同。一是,更加注重多元主体力量的吸纳。体育强国对内是要实现各领域的强,对外要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既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又要助力经济社会的发展,鉴于体育所涉及领域的多维性,需要吸纳各种力量形成发展合力,要充分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家庭等主体的力量,发现、挖掘、调动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实现主体力量的“举国”。二是,实现主体力量的匹配性参与。体育本身具有多元的赶超发展性,我国是典型的体育后发国家,在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领域滞后于发达国家,体育社会组织、体育市场、家庭体育等主体均存在不足,都处于培育发展的阶段,新型举国体制需要注重治理参与体系中各类主体能力的匹配,确保充分、有效地发挥各类主体力量^[16]。

第五,发展环境上由融入全球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构建。国际环境上,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传统的赛事体系可能受到挑战,大型赛事的举办和参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国际体育组织的影响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政治不确定性、新型休闲娱乐冲击等多元因素影响下,可能出现下降态势。在体育产业领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风潮来袭,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增加,我国体育产业大都处于供应链下游环节,极易受制于人或者受到文化侵袭。国内环境上,近些年我国进一步深化体育体制机制改革,体育供给侧

改革和需求端刺激同步发力,体育的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使命,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现整体跃升。在数字化影响日益深入的形势下,体育应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聚力构建畅通的国内大循环体系,不断拓展产业链、健全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同时,在国际体育组织、体育高端人才,高端体育科技等领域加大开放力度,促进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和优化。

第六,作用领域上由重点服务竞技体育到更加关注体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作用领域上,传统举国体制主要作用于竞技体育领域,新型举国体制则更关注体育发展的整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群众体育领域政府承载起体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市场、社会、家庭在高层次、个性化、定制化、时尚化的体育需求领域发挥更大力量;在竞技体育领域,政府对市场化较为薄弱的奥运项目等国际赛事项目给予全面的财政支持,市场在球类、时尚项目等市场化程度较高领域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在体育产业领域政府对产业环境、产业布局、总体规划、基本规则、产业人群培育等起到基础培育作用,市场在产业运行模式、商业模式、产品服务供给创新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新型举国体制对事关各领域的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体教融合、重大赛事、科学训练、产业创新等领域^[17]将发挥更大作用。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是培养体育意识、形成体育能力、养成体育素养的关键阶段,关系到体育产业消费人群的培育;体教融合、重大赛事、科学训练既是优化青少年体育的重要渠道和引擎,也是提高竞技体育为国争光能力的保障;产业创新则是促进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重要发展理念和路径。

3 “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重点领域的落地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事业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落地模式。需要阐明的是新型举国体制并不适合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所有领域,应避免新型举国体制的泛化,聚焦解决体育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3.1 适用于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社会动员”模式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均对群众体育提出了全面发展的要求。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18]。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是体育发展的基础,为竞技体育提供充分的后备力量,为体育产业提供广泛的消费基础。当前,我国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存在体育参与意识不足、体育核心素养不佳、体育参与保障不够等问题,归结为以下环节问题:①基础环节不稳:青少年体育生活化尚未形成;②培育环节失位:学校体育育人功能发挥不足;③支撑环节松散:“家—校—社—企”协同欠缺;④监督环节短缺:青少年体育评价与监控体系尚未完善。针对事关体育根基的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领域^[19],应开展“社会动员”为主导的新型举国体制模式(图1)。林尚立^[20]指出,社会动员是政治团体利用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以实现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为目标而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政治行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既是对党的发展动员历史的经验总结,更是应对新时代所面对的国内国际环境变化的路径擘画。社会动员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在体育领域的实践:第一,社会动员有利于形成青少年参与体育的共识。社会动员通过

媒体宣传、政策引导等整合营销手段对人民的体育认知进行影响,引导社会成员朝着体育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的目标行动,并不断强化自己的体育行为。第二,社会动员有利于“家—校—社—企”各主体协同合作,促进资源的体育集聚。当前青少年体育的发展共同体尚未形成,家庭、学校、社会组织、企业等协同促进作用尚未有效发挥,需充分发挥社会动员,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青少年体育发展新格局。第三,通过教育部等主管部门力量,优化学校体育职能,回归体育育人本质。第四,建立青少年体育发展动态监管与促进体系,形成全社会监管落实与干预促进的格局。以党的领导为核心,聚焦人民多元体育需求,广泛开展行政主导层级式社会动员,内生精英辐射式社会动员,多元共治纵横式社会动员等方式^[21-22],促进我国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进而促进群众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3.2 适用于竞技体育关键环节的“政产学研会”深度融合模式

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长期受益于“举国体制”,成效良好。伴随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其生存基础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变化、新要求、新趋势,竞技体育发展应在关键环节采用“政产学研会”深度融合的新型举国体制模式(图2),即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企业)、学校、研究机构、协会等各类主体的力量优势,形成各展所长、各得其所、协同配合、各取所得的竞技体育发展格局。

政府主体承担起竞技体育发展的总体方向布局、政策谋划、弱项短板兜底和大型赛事统筹工作;市场主体逐渐承担起市场化程度较好项目的人才培养工作,积极参与职业体育,探索符合国情的职业体育发展道路和运行体系;各类大中小学承担起协同育人功能;协会组织对各类项目的发展承担起项目发展推广、赛事体系搭建、专业发展指导、行业规则制定与监管等职责;科研院所等承担起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各类科研攻关,如科学化训练、高端运动装备和设施的研发、科学化参赛研究等,提高竞技体育发展的科学化水平。这一模式中各类主体既具有各自的工作侧重点,又形成了网状协同作用机制,施力于竞技体育发展的各环节,在实践中有几类较为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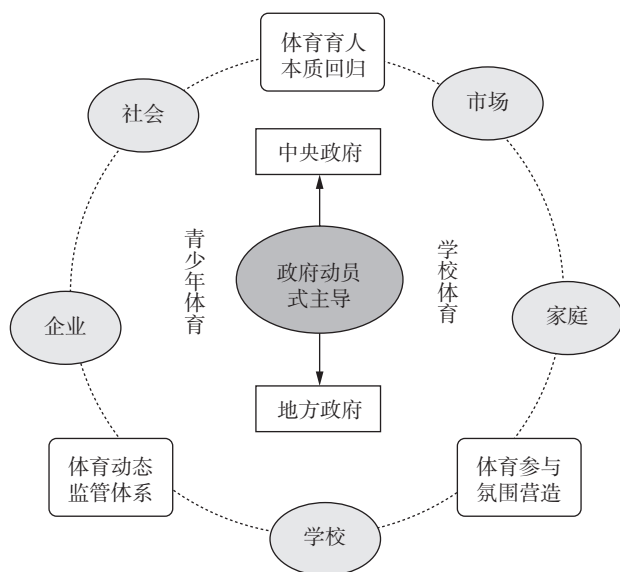


图1 适用于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社会动员”模式

Fig. 1 “Social mobilization” model adapted to youth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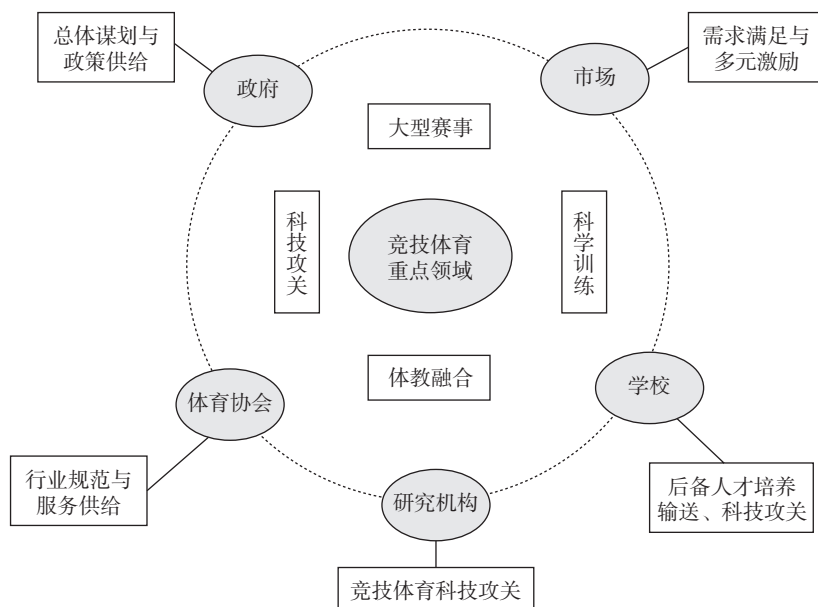


图2 竞技体育重点领域“政产学研会”模式

Fig.2 Model of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Association” in key areas of competitive sports

的应用领域：一是，体教融合领域。依托“政产学研会”融合把青少年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完善运动员的选拔输送、文化教育、人才引进、退役安置等保障激励政策，从根本上保证制度透明、体制透明，形成架构清晰、类型多样、服务多元、竞争有序的现代竞技体育发展新局面。二是，科学化训练科技攻关领域。应充分发挥政府的整体整合力，围绕竞技体育的发展梳理重点科技项目，发动各类体育科研所、各类院校科研力量、创新型企业科技资源等对竞技体育发展中科学化训练、国际体育科技发展前沿等展开突破，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强力科技支撑。三是，大型体育赛事举办。诸如奥运会、世界杯、大运会、军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涉及范围广、筹办周期长、影响力大、国际关注度高，要确保相应赛事的如期成功需要用此种模式统筹各类主体、各类资源^[23]。

3.3 适用于产业链升级和职业体育的“龙头企业”整合带动发展模式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存在着供给不足与供给错配，需求不足与需求外流问题，高端体育产品与服务大都被国外企业垄断。如我国的高端体育赛事版权几乎全部引进，而我国职业体育赛事版权出海困难重重，户外运动、冰雪运动、航空运动等所需要的高端体育装备也几乎被国外市场垄断。总体而言，我国体育产业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的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应加快推进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龙头企业带动的“新型举国体制”模式（图3），实现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关键技术、关键模式与职业体育的突破性发展。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拓展、价值链提升和供应链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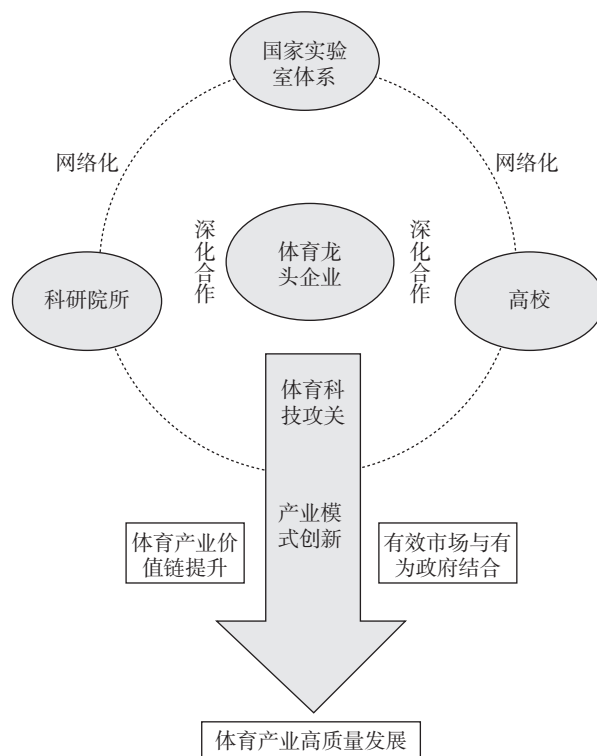


图3 体育产业重点领域的“龙头企业”整合发展模式

Fig.3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 of “leading enterprises” in key areas of sports industry

作用领域包括:一是,加大科技自主研发与引入应用。研究发现,尽管我国在专利总量上仅次于美国的49 167项,以28 351项占全球基本专利的17.09%,位列第二,但是我国专利存在较大的功利化导向,众多专利是特定主体出于评职称、拿资格等目的而为之,并非为了产业转化,在跨国申请的同族专利数量、高产专利权人、三边专利和跨国专利、核心专利上都体现出了较大的不足^[24],我国应加大自主体育科技的研发力度,促进产业主体国际竞争力的形成,这也是推进我国体育产品与服务升级的“质量变革的需要”。二是,加大融合领域科技基础性研究的强度。近年体育领域大力推进体医融合、体卫融合、体旅融合等融合发展,目前在“形”的结合上精彩纷呈,但是在融合的基础性理论研究方面较为薄弱。如体医融合的基础性理论如运动类型、强度与医疗效果的深度关系研究严重欠缺,体文旅融合的底层形态的嫁接缺乏深度的嵌入研究,因此应加强不同融合领域相互嵌入的底层演进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与落地,深化相应领域的数字化嵌入、智慧化嵌入,形成底层逻辑动力,促进产业发展的“动力变革”。三是,加大科技人才培养。创新人才要素,依托产学研协作、高层次平台集聚等方式,培育一批体育产业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应加快完善体育产业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校企联合实践培育。运行方式可以通过政府设立科技引导资金、牵线企业与科研院所等机构进行重点突破。四是,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发展。与国外“内生性发展”的职业体育发展模式不同,我国的职业体育发展具有突出的“外生性发展”的特点,职业体育发展所需要的项目文化基础、运行保障体系、支持体系、专业化经验、国际竞争力等较为欠缺,这恰是体育强国的核心竞争力,是衔接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活跃体育产业的重要突破点,应充分发挥举国体制模式,探索国有企业作为俱乐部主体参与的职业体育发展模式。

4 “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实施路径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深刻阐明体育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十四五’时期,要科学研判体育发展面临的新

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体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属性特征、覆盖范围、关涉对象、突破难度的不同,在落地模式上有所不同,但应基本遵循以下路径。

4.1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中“党”的元主体价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各类事业取得突飞猛进成效的经验和法宝之一。党政特色是我国国家治理的优势所在。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是历代领导人的情感自觉、行动自觉、行政自觉,体现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奋斗的体育实践。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需要坚持并不断完善以“党组织为元治理主体”的整体性治理制度。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从国家体育意志和国民体育需要出发,锚定国家战略目标,明确战略需求,做出战略决策,通过战略—规划—计划一体的顶层设计,逐层分解、细化战略需求,综合当前世情、国情、体情和未来情况,确立总目标,谋划总方略,推进总思路,更好地以新型举国体制的治理体系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举国体制的作用发挥通常离不开国家各级财政、国家储备、国有经济和社会动员等4类资源,政府在国家财政、国家储备和国有经济等资源领域具有主导甚至决定性作用,但在社会动员上则存在众多欠缺,尤其是社会力量、市场力量乃至家庭力量崛起的背景下,政府在社会微观层面的触角逐渐式微。而党组织则能够弥补举国体制推进中行政力量的不足。党组织不仅广泛存在于各级政府行政部门,还广泛存在于企业、社会组织、任务型组织乃至家庭之中,企业和社会组织设有基层党组织,通过网络化的组织能够实现对政府、市场、社会乃至家庭等基层组织单位的全领域领导和价值影响。面对体育强国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行政体系能够充分发挥科层制的体制优势,积极配合建设进程中所需要的各类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非科层组织网络则能够深入行政体系以外的领域,更有效地调动社会、市场等资源,保障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目标的效益达成^[25]。

4.2 选定“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力量”

新型举国体制是建立于党政统筹协调的组织基

础之上的特殊治理方式,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是要形成政府、市场(企业)、社会、人民等各类主体的力量协同,形成基于共同目标匹配各主体能力的治理体系。而在这一体系和制度的推进进程中,战略力量是事业的核心,就当前事业发展和力量能力的角度而言,需要确定党的各级组织、各类学校、国有企业、任务型组织、社会组织等核心战略力量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级党组织是领导和嵌入式力量,是无处不在的督促和反馈力量,首先在确证元主体领导力量的同时,确证战略力量定位,源于使命,更源于现实需要。基于战略力量,第一,形成各类主体对体育强国建设领域举国目标的认同感。通过这种目标认同,促进各类主体从日常的繁琐事项中抽身出来,调动自身资源投身于体育强国建设中来。就政府而言,应打破行政壁垒,畅通关联部委及下级行政体系的联系机制,形成网络化的行政支持体系,构建针对体育强国建设的部际、府际联席机制,加强国家与地方、省级与市级,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联动工作机制,让各类主体都能够参与体育强国建设。第二,形成学校、龙头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环境投身体育建设的使命责任。在确立核心、情怀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合力与转化。第三,建立匹配性的协同制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布瑞·利雅在《治理改革:让匹配变得正确》一文中提出了“以良好匹配(good-fit)来取代直到最近还在治理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最佳时间’路径”的观点^[26]。即在治理中每一个主体都有其能力状态和适宜领域,且随着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发展呈现动态变迁的状态。就体育强国建设的“新型举国体制”推进总体而言,政府显然掌握着最大的资源和行动力量,应起到宏观规划、市场监管、氛围营造、简政放权、社会培育、兜底等作用;市场主体也在逐渐发展,体育企业创新意识不断提升,在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商业模式探索、人才培养等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组织由于长期居于依附性的状态,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放权和培育,以促进社会组织力量的成熟。

4.3 设定“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项目

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落地,不是简单的一次到位,也不是全领域的粗暴式使用。其

推进体育强国建设需要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一个个具体项目的实施,国家、各级政府应在项目实施中起到引领布局作用,确定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举国攻关内容,并进行层级分解和领域分解,分层分类分领域落实。一是,项目形成。在体育强国建设中,根据竞技体育、群众领域、体育产业等领域发展目标和阶段特征,梳理出关键短板和重点领域。对竞技体育的科技创新、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后备人才培养等关键领域,群众体育中的健身场地设施、百姓健身工程等,体育产业领域的重点技术、消费落地政策等进行逆向分解和反向求解,采用“揭榜”制,向全社会征集研究方案,建立项目库。二是,项目管理。根据项目库,对不同类型的项目采用公开招标、委托代理、市场社会授权等方式,移交给各类主体进行重点突破,根据实施难度和工作强度给予一定的支持,并对承接主体和对象进行过程性监管。三是,将相应成果进行转化与推广。如对大型体育赛事举办的经验,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经验,上市体育企业的发展经验,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经验等进行普及推广。近些年,国家体育总局开展的决策咨询委托项目,遴选每年体育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形成重点研究项目,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等形式向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进行发标承接就是一种典型的项目实施方式。科技助力奥运的系列项目也是很好的示范,大型体育场馆设施、体育小镇、体育综合体等建设中推进的PPP模式等也是政府、市场、社会合作的探索。

4.4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评价激励

新型举国体制的“新”表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优势、人类数字文明新革命的广泛融入,是对多元力量主体的吸纳。要形成对各类主体的有效吸纳还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保障,这一制度保障旨在根据不同主体的发展阶段、能力层次和贡献大小回馈以相对应的回报。在体育强国建设的进程中体育相关的各级行政组织、事业单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任务型组织等正式组织,体育社群、家庭等非正式组织将发挥不同的价值和作用^[26]。针对主体的不同,应该建立差异性的考核评估体系和机制,确保各类力量的持久投入。逐利性是市场主体的最大特点,目前,我国体育企业普遍缺

乏企业家精神,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也未能有效建立起社会责任体系。鉴于此,政府应兼顾企业对“盈利”目标的追求,制定能够给企业带来相应收益的制度。如国家体育总局开展的国家产业基地评选和建设,拿到国家产业基地的企业在参与招投标的过程中通常能得到一定的加分;如众多省份所设立的体育产业引导资金,也是通过政府力量进行企业参与强国建设引导的制度设计,并产生了积极的成效,有效撬动了市场的参与。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其自身正处于立足发展阶段,其专业性、实体化也正处于培育发展阶段,政府应通过购买服务、行业授权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民众对于社会组织的认同^[27-28]。学校、科研院所等市场逐利性不强,但对于荣誉、地位等有所诉求,应建立针对不同领域的荣誉体系。对业余俱乐部、社会组织等参与体育强国建设的主体,应建立追踪性、跟踪性的补偿体系,让投入者得到应有的回报,激励各类主体积极参与体育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 [1] 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EB/OL].[2019-09-02].http://www.gov.cn/xinwen/2019-09/02/content_5426540.htm.
- [2] 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1-03-13].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3] 陈尚伟,刘原,孙晓华,等.习近平关于体育强国重要论述的价值特性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1,36(3): 265-273.
- [4] 袁守龙.从“举国体制”到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思考[J].体育科学,2018,38(7): 12-14.
- [5] 王雪莉,付群,郑成雯.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与路径探索[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43(1): 1-15.
- [6] 沈克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形态与方略举措[J].体育学研究,2021,35(2): 11-19.
- [7] 雷小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研究[J].经济学家,2021(12): 14-21.
- [8] 孙祁祥.如何认识我们的体制优势[J].经济研究参考,2020(12): 5-9.
- [9] 王家宏.我国体育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中政府职能作用的实现路径[J].体育学研究,2018,1(3): 5-14.
- [10] 刘志国,吕志君,闫士展.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制度自信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6): 71-79.
- [11] 张翔,刘苏.“动员激活常规”:新型举国体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J].理论与评论,2020(4): 49-58.
- [12] 何虎生.内涵、优势、意义:论新型举国体制的三个维度[J].人民论坛,2019(32): 56-59.
- [13] 黄建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逻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8): 43-51.
- [14] 鲍明晓.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新机制[J].体育科学,2018,38(10): 3-11.
- [15] 杨志亭,孙建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发展与完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293-295.
- [16] 王凯.论“新举国体制”[J].体育学研究,2018,1(4): 8-15.
- [17] 王静.论构建新型举国体制三题[J].长白学刊,2022(1): 37-43.
- [18] 中国政府网.习近平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EB/OL].[2013-08-31].http://www.gov.cn/jrzq/2013-08/31/content_2478346.htm.
- [19] 孔琳,汪晓赞,徐勤萍,等.体教融合背景下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解决路径[J].中国体育科技,2020,56(10): 29-35.
- [20]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 [21] 贾玉娇.基层社会动员的机理与结构——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21(1): 52-58.
- [22] 钟秉枢.新型举国体制:体育强国建设之保障[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3): 1-7.
- [23] 戴健.走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之路[J].体育学研究,2023,37(2): 115.
- [24] 万宇,张元梁.国际体育器材专利技术竞争情报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8,35(5): 521-531.
- [25] 王浦劬,臧雷振.治理理论与实践:经典议题研究新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 [26] 谢富胜,潘忆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5): 156-166.
- [27] 刘亮,赵晓慧,徐凤萍.组织形态现代化:新型体育举国体制的时代命题、理论阐释与政策考量[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3): 59-68.
- [28] 贾根良.构建以公共采购为支撑的“网络型举国体制”——保障以市场需求为主的核心技术创新[J].国家治理,2020(42): 41-44.

作者贡献声明:

王凯:构思论文框架,撰写、修订论文;周国鑫:搜集材料。

Contemporary Value, Implementation Mode and Fulfillment Path of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WANG Kai¹, ZHOU Guoxin²

(1.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2. *Graduate Department,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is the blueprint drawn by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for sports, and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is a powerful strategy to promote this process. The multi-dimensional catching up and surpassing nature of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require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the complexity of tasks require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main bodies of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and the diversity of functions requires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adheres to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with regard to the core of leadership, and increasingly reflects th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of “meta subject”.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 sports of “winning honor for the country” has shif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 centered sports; In term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ere is a shift from planned allocation of hard resources such as human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soft and hard resources such as human, financial, materi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parties, it witnesses transformation from a single government entity to a collaborative and efficient approach involving multiple forc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market, society, and family;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t demonstrates a change from the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originally to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dual circulation pattern; In terms of application fields, there is a shift of focus from mainly serving competitive sport to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key areas and links in mass sports, competitive sports and sports industry.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has a “social mobilization” model suitable for youth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includes a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Association” integration model suitable for key links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a development model suitable for industrial chain upgrading and professional sports which is driven by “leading enterprises”.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through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has been proposed, including leveraging the primary value of the “meta subject”, selecting strategic forces, setting important projects, and improving evaluation incentives.

Key words: a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competitive sports; meta subject; meta-governance; national fitness; people-centered; social mobilization